

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 首位教师王家彦生平事迹考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的第一位教员，也即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王家彦于1902年以“大挑知县”身份来甘肃为官，于1902-1903年署任平远县知县，于1903年担任甘肃乡试考官，于1903-1905年出任甘肅厘金委員，于1905-1907年转任肅州直隸州王子庄州同，于1907年3-7月署任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主政敦煌县期间，奉命接待到访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却因监管不力和渎职等因，导致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物劫运出境。王家彦在处理敦煌县农民抗粮运动过程中手法过激，最终酿成1907年敦煌民变。王家彦被调离敦煌后，于1908年弃官从教，参与创建甘肃法政学堂，并于1909年1月被任命为主讲律例和宪法的首位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家彦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邀，署任新疆省内务司长，终因积劳成疾，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逝。

关键词：王家彦 甘肃法政学堂 兰州大学 敦煌 斯坦因 杨增新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22）02-0180-22

一、引子

兰州大学创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当时的校名是“甘肃官立法政学堂”（以下简称“甘肃法政学堂”）。根据1909年12月27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甘肃教育官报》第5期上刊布的《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1909）上学期调查表、职员调查表、教员一览表、各班学生调查总表》记录，甘肃法政学堂于1909年1月22日至2月19日间（宣统元年正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甘肃法政馆”。^①在甘肃法政学堂初创的1909年上半年，其教职员工等情况可列表

收稿日期：2021-05-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12&ZD140）

作者简介：王冀青（1961-），男，陕西渭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古学史研究。

^① 《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上半年调查表、职员调查表、教员一览表、各班学生调查总表》，《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34-35页。

如下：

职员调查表				
姓名	籍贯	官阶	职务	到堂年月
陈曾佑	湖北人	署理甘肃提学使司	监督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刘振镛	直隶人	调补兰州府知府	正提调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延祉	满洲人	调补直隶州知州	副提调	宣统元年六月到堂
张金镶		大挑知县	教务长	宣统元年六月到堂
高彝	陕西人	准补宁朔县知县	官班监学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李拱宸	四川人	日本法政专门毕业生，试用县丞	绅班监学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谢维祯	河南人	试用直州判	文案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孙毓玮		试用从九	会计员	宣统元年六月到堂
教员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官阶	教授学科	到堂时间
王家彦		大挑知县	律例、宪法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程宗伊		日本法政毕业，改选知县	民法、行政	宣统元年闰二月到堂
王国柱	湖南人	日本法政毕业，指分陕西试用县丞	民诉、经济、 法学、政治	宣统元年二月到堂
赵毓岳		日本警察毕业，甘肃试用县丞	国际、刑法、 监狱	宣统元年正月到堂

根据上表所列，甘肃法政学堂在初创期（1909年上半年）的教职员工包括陈曾佑（1859-1920）等职员8人、王家彦（1850?-1913）等教员4人。（图1）既然甘肃法政学堂是兰州大学的前身，那么甘肃法政学堂初创期的教职员工，即为兰州大学的奠基人。陈曾佑是甘肃法政学堂的首任监督，并于1909年1-2月（宣统元年正月）最早到堂任职，应被视作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任校长。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排序第一位的教员，也于1909年1-2月（宣统元年正月）最早到堂任教，应被视作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甘肃法政学堂创始人陈曾佑等8名职员、王家彦等4名教员的生平事迹，鲜有专文加以介绍。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肯定是档案资料的缺失。民国初期的1913年7月23日，甘肃省财政司长田骏丰（1878-1917）“以历朝档案堆积如山，非惟地小不足以回旋，又恐办公各员稍一不慎，致酿回录之灾”为由，

二、王家彦的出身及其科举经历

关于王家彦的字号、籍贯等基本履历信息，上列甘肃法政学堂《教员一览表》中空缺失记。曾于1902-1906年任甘肃学政的近代学者叶昌炽（1849-1917），在其1902年10月30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记录王家彦时说：“王大令号少卿，云南浪穹人。”^①叶昌炽1904年3月19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日记中，又将王家彦的号写作“绍卿”。^②按清人字号有同音不同字的习惯，王家彦号少卿，抑或号绍卿，皆属正常。叶昌炽1902年10月30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王家彦是“云南浪穹人”，又为我们提供了王家彦的籍贯。清代浪穹县属云南省迤西道大理府，清亡后于1913年改名洱源县。因此可确定，王家彦的籍贯是清云南省大理府浪穹县（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关于王家彦的出生时间等基本信息，由于履历档案的缺失，我们迄今仍一无所知，只能略作推测。斯坦因于1907年3月13日在敦煌县初见王家彦时，在当日日记中说：“王大老爷（Wang Daloi）是一位快活的老人，举止优雅。”^③而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中又说：“知县是一位体格瘦小的中年男子。”^④按照一般标准，中年或老年的模糊年龄段，应在50-60岁之间。又据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为王家彦拍摄的照片《敦煌县知县王大老爷和他的妻子与母亲》（Wang Ta-lao-ye, Magistrate of Tun-huang, with his wife and mother，以下简称《王家彦全家福》）”（图2），王家彦当时的年龄应在50岁以上。在缺乏确切履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暂将1907年时的王家彦年龄推测为57岁左右，将他的出生年份推测为1850年左右。

如果对斯坦因摄《王家彦全家福》进行目测分析，我们还可提取以下几点履历信息。首先，王家彦之母显系天足，看不出清朝汉族妇女的缠足小脚，加以服饰、头饰也非传统汉族样式，似可推测其为西南少数民族妇女。清云南省大理府浪穹县（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王家彦有可能出身于西南少数民族，至少有西南少数民族血统。其次，王家彦之妻看上去要比王家彦年轻许多，显然缠足，应系近期所娶汉族妇女。第三，王家彦怀抱3-4岁左右的长子，其妻怀抱1-2岁左右的次子，皆说明王家彦在甘肃有中老年得子的经历。

关于王家彦入仕所经由的科举考试，我们今日能看到的唯一记录，是周沆撰《浪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册，第3859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338页。

③ 斯坦因1907年3月13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以下简称“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8号，第104张。

④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Vol. II, p. 14.

穹县志略》，刊印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该志卷八“优贡、国朝”条记录：“王家彦，光绪己卯科。”^① 据此可知，王家彦是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的优贡生。王家彦于1879年取得优贡生身份后，当年便参加了乡试，即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代补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乡试。由于太平天国等战事的影响，云南省乡试自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六年（1867）停考6科。^② 按规定，各省停考乡试，于后来其他乡试年份补行。无疑，云南乡试停考对王家彦并无多大影响，因他后来参加的乡试只有代补前科考试的名义。《浪穹县志略》卷八“举人、国朝、光绪己卯科带补丁卯科”条记录说：“王家彦，由优贡中式。现署甘肃平远县知县。”^③ 由此可以肯定，王家彦于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中举，但名义上系代补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中举。

按清朝制度，乡试中举后，举子要赴京参加会试。会试落第者，以后还会不断参加会试。1879年（光绪五年）后的会试年份，依次是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等。依常理推断，王家彦应该从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开始参加会试，至少参加了三科会考，但肯定都未考中，因为他后来取得知县官衔的途径是“大挑”。叶昌炽1903年9月27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日记中，提到“大挑县王家彦”。^④ 上引甘肃法政学堂《教员一览表》中，王家彦官阶栏中填写的也是“大挑知县”。^⑤

所谓“大挑”，是清朝乾隆以后选拔人才的一种补充性制度。凡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可挑取其中一等者以知县用，挑取其中二等者以教职用，旨在给举人出身者以较宽的出路。大挑每6年在北京举行一次，挑取标准以形貌为重，也即以貌取人。关于大挑的标准，清人徐珂（1869-1928）在《清稗类钞》“大挑知县”条中记录说：

大挑论品貌，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则面方长，“田”则面方短，“贯”则头大身直长，“日”则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身”则体斜不正，“甲”则头大身小，“气”则单肩高耸，“由”则头小身大，皆不中选。^⑥

大挑时，每班20人，挑取一等3人为知县，二等9人为教职，其余8人落选。《清稗类钞》“大挑知县”条记录其过程如下：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余

① 周沆《浪穹县志略》卷8，1903年，第32页。

②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页。

③ 周沆《浪穹县志略》卷8，第11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226页。

⑤ 《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调查表、职员调查表、教员一览表、各班学生调查总表》，《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34页。

⑥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册，第1350页。

九人不唱名，皆以教取用，自出，更一班进。^①

王家彦既然是大挑知县，说明他有举人出身，且至少参加过三科会试，会试不中后才走大挑之路入仕当官。王家彦能在大挑时被录取为一等，以知县用，说明他青年时相貌出众，符合“同”（面方长）、“田”（面方短）、“贯”（头大身直长）、“日”（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四字条件之一。关于王家彦在北京参加至少3次会试的具体时间，以及其后在北京参加大挑面试的具体时间，我们均无确切资料。



图2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拍摄的王家彦全家福照片^②

三、王家彦的早期仕宦生涯

据1903年刊《浪穹县志略》记录，王家彦在中举后“现署甘肃平远县知县”。这说明王家彦以大挑知县身份担任的第一个县级职务，便是署任甘肃省固原直隶州平远县（今宁夏同心县）知县。这条记录也暗示，王家彦此前并没有担任过其他县官。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在敦煌县见过王家彦刚从陕西接来的老母亲，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高贵的主妇，刚从陕西来此地和儿子团聚。”^③既然王家彦来甘肃当官若干年之后，才将母亲从陕西迎到甘肃敦煌县团聚，说明王家彦到甘肃做官之前，应在陕西省居留过一段时间。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皇室西窜至西安府，直到1902年1月才迁回北京。在此期间，大批官员汇聚陕西“勤王”，王家彦可能也于此时来到陕西，再由陕西调往甘肃做官，但具体途径不详。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350页。

^②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illus. 209.

^③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233-234.

关于王家彦来甘肃署任平远县知县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记录见于叶昌炽的1902年10月30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叶昌炽于1902年6月3日到达兰州府，于6月6日在兰州接甘肃学政官印，随后在兰州晤见甘肃各级官员，但其中并没有提及王家彦，说明当时王家彦并不在兰州。叶昌炽下车伊始，便于1902年6月20日离开兰州，进行第一次全省巡回考试。叶昌炽于1902年10月30日途经平远县时，在距离平远县同心城160里的地方，第一次见到署平远县知县王家彦。叶昌炽1902年10月30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记录说，他进入平远县境后，先穿一土峡，出峡后见到前来迎接的王家彦：

出峡，即见平远县王家彦、典史奥镇锬、同心城守备吕福元，同迎于峡口。王大令号少卿，云南浪穹人。自城百六十里远来。又有陕西陇州童生封长禄在此训蒙，递禀言馆穀式微，求为推穀。此非使者事，掷还之。自渡河，约行三里，至同心城。皆回民，颇稠密，行馆在城内。以次见王大令、吕守戎，厘金局委员祥启与奥典史同见。^①

叶昌炽在同心城逗留一晚，次日离去，王家彦等为其送行。据叶昌炽1902年10月31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日记记录说：“卯刻发。王大令、吕守戎同来送别。”^②以上叶昌炽日记可证，王家彦署理平远县知县的时间，至迟应在1902年秋。

叶昌炽离开平远县后不久，王家彦即卸去署平远县知县职务，该职由署隆德县知县秦瑞珍实任。叶昌炽西返兰州途中，于1902年12月2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经过隆德县，受到刚被任命为平远县知县的秦瑞珍迎接。叶昌炽当日日记中记录说：“惟见秦大令，即往答拜。夜，大令又便服来见，馈礼四色。却之不可，受辽参、丽参各两匣。新选平远县典史、江宁同乡胡国樑（号季直），以赴任道出此间，持瞿韶生函来见。以平远瘠苦，求量移善地。告以鄙人不能越俎，且甫经履新，少安无躁。”^③叶昌炽于1903年1月2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返回兰州的当天，又从仆人那里听说新任平远县知县秦瑞珍等人遭言官弹劾的事情。叶昌炽当日日记中说：“仆辈来言：何方伯为言官所劾，波及首县、镇番县郑大令、平远县秦大令、刘让木刺史、杨鼎臣太守，交崧帅查办。仆过隆德时，秦大令以平远瘠苦，视为畏途。言者称以三千金得之，冤矣。”^④从胡国樑、秦瑞珍的态度看，当时甘肃省官场多视平远县为瘠苦之地，视平远县知县为畏途。一般情况下，这种官职适合初来乍到的官员担任。王家彦到甘肃后即署任平远县知县，一方面反映出大挑知县在官场上备受歧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王家彦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王家彦卸去署平远县知县后，于1903年内在兰州居住，其间常与叶昌炽等交往。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859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860页。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924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930页。

据叶昌炽 1903 年 6 月 8 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日记记载：“申刻，玉畴招饮。与志樾汀、罗穆倩、吴筱阶、洪汉泉、王少卿同席。”^①叶昌炽 1903 年 6 月 9 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日记中又记录说：“王卓亭、洪汉泉、王少卿、吴筱阶、截取直隶州侯葆文（号真甫）先后来见。”^②1903 年 6 月 12 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王家彦又和叶昌炽等一起吃饭，据叶昌炽当日日记记录：“申刻，为志樾汀、李伯琛洗尘，并约玉畴、穆倩、杜同巢、吴筱阶、王少卿、李瀛舫诸大令作陪。未秉烛即散。”^③

在叶昌炽的举荐下，王家彦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在甘肃乡试中调充帘官。帘官即乡试考官，分内帘官和外帘官，以贡院应试之所至公堂后门的隔帘为界限。内帘官主管主考、同考、阅卷等工作，外帘官主管提调、监试、受卷、誊录等工作，王家彦属于分房阅卷的内帘官。据叶昌炽 1903 年 9 月 27 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日记记录：“见帘官单。第一房：靖远县刘文海；二：截取直隶州侯葆文；三：大挑县王家彦；四：中卫县张心镜；五：朱远缮；六：陈易奇；七：汤霖；（皆甲班知县。）八：候补直隶州王学伊。”^④八房房师中，除第一房刘文海和第三房王家彦系举人出身外，其余六房皆为各科进士出身。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家彦虽非进士出身，但学识颇优，堪任全省乡试内帘官之责，并深得叶昌炽赏识。

1903 年乡试后的一段时间，叶昌炽日记中很少提及王家彦。可以推断，王家彦已于 1903 年底或 1904 年初离开兰州，转往河西地区的甘凉道、安肃道任地方官。

四、王家彦在河西各地的任职经历

王家彦在河西地区任职的起点在甘州府，首先担任主管当地征收商业税的甘州厘金委员，但具体时间不详。据叶昌炽 1904 年 1 月 31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记记录，当日有“卸办甘州店厘金委员麦方堃来见”。^⑤据此可推测，王家彦接替麦方堃担任甘州厘金委员的时间，应在 1903 年底或 1904 年初。1904 年的春节，王家彦返回兰州过年，年节后又帮助杨增新（鼎臣，1858-1928）办理丧事。叶昌炽 1904 年 3 月 19 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日记中记录：“杨鼎臣同年丁内艰，吊诸其寓。其同乡王绍卿大令暨冰臣、次君陪宾，略谈即归。”^⑥杨增新系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人，于 1888 年（光绪十四年）参加本省乡试中举后，考中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128 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128 页。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131-4132 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226-4227 页。

^⑤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304 页。

^⑥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 7 册，第 4338 页。

士，以知县签分甘肃，于1889年10月14日到省，历任署中卫县知县、渭源县知县、署兰州府河州知州、甘肃大学堂提调、甘肃武备学堂总办等职。王家彦和杨增新有云南同乡之谊，又在甘肃同班为官，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王家彦任甘州厘金委员期间，在甘州多次接待过叶昌炽。叶昌炽于1904年8月26日离开兰州，第二次前往河西走廊一线巡回考试时，于1904年9月21日（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二日）在甘州府附近的青龙铺，受到甘州府知府刘振镛（晓山，1848-?）、甘州厘金委员王家彦等人的迎接。叶昌炽当日日记中记录说：“甘州府刘晓山太守、厘金委员王少卿……同迎至此。……既进城，先拜张军门，谈良久。又至府、县、电报、厘金两局，及徐参戎处，答拜，皆未见。即至行馆，先见刘太守，次徐参戎，次李粹庭，王少卿同见。”^①叶昌炽在甘州府逗留一晚后，次日即离开甘州府，前往肃州主持考试。

1904年10月16日，叶昌炽离开肃州东返，于1904年10月22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四日）又到甘州，再次见到刘振镛、王家彦等人。叶昌炽当日日记中记录说：“甘州府刘晓山太守，偕厘金委员王少卿……同迎于弱水南岸。……进城，至贡院，先见刘太尊，谈甚久。粹庭、少卿同见。”^②随后几天，叶昌炽在甘州府主持考试。考试完毕后，叶昌炽于1904年11月3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再次见到王家彦。叶昌炽当日日记中记录说：“辰刻，发落生童毕。先见刘太尊，久谈。曹煦初大令自高台来，问张军门疾，与李粹庭、王少卿同见。……夜，同城文武招饮于山西馆。刘太守、李大令、周通守、徐参戎、恩参戎为主，少卿、煦初陪座，深昏始归。”^③1904年11月4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叶昌炽在甘州逗留一天。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夜，刘太守招便饭，屡却不可。至，则依然盛设。谱琴、少卿、煦初、粹庭、徐、恩二参戎并陪座。”^④次日，叶昌炽离开甘州，“辰刻发。文武皆送于郭外”。^⑤如果送行者中有王家彦的话，那么这应是王家彦与叶昌炽的最后一次见面。

关于1905年内王家彦的情况，没有资料可以说明，应该仍在甘州厘金委员任内。1906年春，王家彦改任肃州直隶州的王子庄州同，这是肃州直隶州知州的副手，驻扎地是州治东北方的王子庄堡。^⑥王子庄州同是甘肃省县级官员中很注重的一个职位，一般安排大挑知县担任。根据叶昌炽1903年8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日记^⑦、1903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日记^⑧、1904年9月27日（光绪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556-4557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613页。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623-4624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624-4625页。

⑤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625页。

⑥ 吴人寿、何衍庆《肃州新志》，1897年，第15页。

⑦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185页。

⑧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271页。

三十年八月十八日）日记^①，吴巽卿于1903-1905年任王子庄州同。又根据叶昌炽1905年4月23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日记，^②杨少康于1905-1906年署任王子庄州同。杨少康之后，王家彦于1906年春改任王子庄州同。叶昌炽临离开甘肃前夕，于1906年5月3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在日记中记录道：“阅省钞：……准补秦安黄国琦、王子庄州同王家彦，皆飭赴本任。”^③这是叶昌炽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王家彦。此后，叶昌炽于1906年6月2日离开兰州府，返回苏州过隐退生活。

就在王家彦任王子庄州同期间，位于甘肃最西端的敦煌县，因为农民旷日持久抗缴“采买粮”的运动，而引发社会动荡。“采买粮”始于1730年（雍正八年），本是清廷在沙州卫（敦煌）实施的一项鼓励垦种的惠民土地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后，“采买粮”逐渐演变成一种“利归于官、害归于民”的盘剥农民手段。^④时至晚清，敦煌县农民多次上书清朝各级政府，要求撤销这个不合理的陋规，但都未能如愿，结果导致当地官民对立日益严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崧蕃（1837-1905）调任陕甘总督，到任后于1902年4月任命汪宗翰（1845-1920）为敦煌县知县。由于汪宗翰不善理政，导致敦煌县官民矛盾日益尖锐。^⑤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巡抚升允（1858-1931）升任陕甘总督。随后，升允于1905年10月28日至11月26日间（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委派候补直隶州侯葆文赶往敦煌县实地调查局势。侯葆文将调查报告呈覆后，升允将汪宗翰调往省城兰州，^⑥又先后任命郑彤阶、黄万春署任敦煌县知县。黄万春于1906年3月4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接替敦煌县知县一职后，任内仍无法解决“采买粮”问题。^⑦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冬，升允又委派王子庄州同王家彦就近至敦煌县实地调查。^⑧王家彦调查完毕后，向升允呈交了调查报告，其中建议说，如果官民各让一步，将“采买粮”减半征收，农民补缴欠粮，则敦煌百姓有可能接受。王家彦还表示愿意到敦煌署任知县，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初，王家彦被升允任命为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571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4785-4786页。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203-5204页。

④ 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页；Wang Jiqing, “Stein and Chinese Officials at Dunhuang”, *IDP New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No. 30, 2007, pp. 2-4; Wang Jiqing, “Aurel Stein’s Dealings with Wang Yuanlu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Dunhuang in 1907”, In Helen Wang (eds.),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pp. 1-6; 王冀青《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06-250页。

⑤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46页。

⑥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6页。

⑦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6-647页。

⑧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

署敦煌县知县，^①于3月11日晚与前任黄万春交接官印。^②

五、王家彦与斯坦因在敦煌的相遇

斯坦因于1906-1908年在中国西北进行其第二次中亚考察，其间于1907年3月12日率师爷蒋孝琬（1858-1922）等人，从新疆方向到达甘肃敦煌县县城。刚刚履新的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是甘肃省第一个接待斯坦因的官员，但对斯坦因到访事一无所知，对斯坦因一行也未加重视。^③斯坦因进入敦煌县城后，找到知县衙门，通过一名衙役通报信，这才引起王家彦的重视，派亲丁何林帮斯坦因寻觅住所。^④在何林的帮助下，斯坦因在敦煌南城门外一片果园中找到住所。关于此经历，斯坦因在3月12日日记中记录如下：

提前给衙门里送去了消息，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听说，新县刚刚于昨天履新，这件事可以解释被忽略的原因。得不到官方的关注，师爷感到非常烦恼不安。……被人带到一处供住宿的客栈，是绝对不可用的地方。遇见了好几位来自喀什噶尔和哈密的突厥族商人。找来一位看上去肮脏齷齪的衙役，他骑马返回河左岸，去检查被提议用作住宿地的花园。……知县的“大爷”来给我们当向导。^⑤

斯坦因到达敦煌县城的次日，于1907年3月13日中午赴知县衙门首次拜访王家彦。对此，斯坦因3月13日日记记载说：

正午12时，赶到衙门。外观装饰已退色。王大老爷是一位快活的老人，举止优雅。他向师爷表示道歉。谈论古代城墙和千佛洞。千佛洞的泥塑远近闻名。潘大人和唐僧。王氏知道《西域记》！……裹在漆皮里的一次艰苦磨练。穿着黑色外套，差不多冻僵了。冒着狂烈的沙尘暴，穿过半废弃的街巷，返回住所。^⑥

关于首次拜访王家彦的经历，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如下：

“县官”王大老爷（Wang Ta-lao-ye, the ‘Hsien-kuan’）很快便显现出他是一位特别有教养、举止格外文雅的官员。于是，在蒋氏的热情帮助下，我和王大老爷两个人接着又欢快地畅谈着学问方面的事情以及古代的事情，很快便忘记了我在身体方面感到的不舒适，以及这种不舒适让我产生的那种想尽早离去的念头。^⑦

王家彦与斯坦因初次见面就“欢快地畅谈着学问方面的事情以及古代的事情”，说明王家彦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王家彦给斯坦因留下的第一印象，据斯坦因在《契丹沙漠

①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

②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10.

③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9-10.

④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10-11.

⑤ 斯坦因1907年3月12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8号，第103v张。

⑥ 斯坦因1907年3月13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8号，第104张。

⑦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14.

废墟》记录说：

知县是一位体格瘦小的中年男子，但他的脸庞上显露出他有着敏捷的智力（参见第 209 幅插图照片）。他举止颇为优雅，看上去有学者风度，而且很健谈，所有这些都使我联想起亲爱的潘大人（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我本能地感觉到：上苍真是有眼，给敦煌委派来了一位最恰当不过的官员，我在这片古代边境地区进行第一次工作时，他是会帮助我的。当然，我还不失时机地、适当地提起了我那位引路圣人和庇护圣人玄奘。我高兴地发现，知县真是一位广读博览的学者，他竟然知道这位伟大求法高僧写的那部真实回忆录《大唐西域记》。^①

斯坦因拜访王家彦期间，还请王家彦代向兰州的陕甘总督升允拍发一封致意电报，说明自己已经从新疆省进入甘肃省。王家彦同意了斯坦因的请求，按斯坦因 1907 年 3 月 13 日日记中所说：“他答应要用‘陛下专用（H. M. S.）’码给制台（Tsi-tai，总督）拍发电报。”^②与此同时，王家彦也必定会按照晚晴官场要求，向升允、甘肃省按察使陈灿（1850-?）等人报告斯坦因的入境日期。

按照当时的官场习惯，客人拜访主人后，主人也要尽快回访。关于王家彦回访斯坦因的经过，斯坦因 1907 年 3 月 13 日日记中记录说：

我还没来得及在帐篷里提醒自己，王氏就来回访。冰冷破败的谷仓成了我会见客人的场所。我向他出示了尼雅出土简牍、图版、楼兰遗址发现物。他确实知道楼兰，但是不能确定鄯善。他精通新疆的地理学和正史记载。……令人愉快的学术性的会谈，潘氏的印象又重现在眼前。……安西附近的古代遗址，以及位于甘州以南的古代遗址。道路沿线显然有许多废墟。他希望我能继续前进，前往西安府。^③

关于此次回访，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

我从近在手边的骡马驮箱中取出了一些发掘于尼雅和罗布淖尔的汉文文书样本，还有早期发现物的照片图版，以及其他任何能让好古的县令一饱眼福的东西。

效果真是再好不过了。王大老爷尽情地享受着我为他出示的东西能给他提供的富有学术味的款待。凭着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无疑产生于他对本课题的兴趣——他基本上能设法领会我用非常蹩足的中国方言大胆地向他请教的有关考古学方面的质询和问题。我发现他对中国新疆（Eastern Turkestan）的地理非常熟悉，因为中国正史中多有记载；他对近代中国人在新疆的行政管理也很熟悉，虽然他并未在新疆任过职。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他坦率地承认，关于我在沙漠中已经寻找到了的烽燧和长城废址路线，书本上并没有告诉他任何知识。^④

王家彦回访斯坦因期间，两人主要谈论新疆考古与历史。斯坦因让王家彦看了他从尼

^①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14-15.

^② 斯坦因 1907 年 3 月 13 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 198 号，第 104 张。

^③ 斯坦因 1907 年 3 月 13 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 198 号，第 104 张。

^④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15-16.

雅、楼兰等遗址发现的汉文文书标本，以及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的一些照片，王家彦极感兴趣。王家彦在和斯坦因交谈的过程中，又通过蒋孝琬说明了当时敦煌县社会的动荡局势。

六、王家彦对斯坦因敦煌烽燧考古的态度

王家彦署理敦煌县知县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敦煌农民常年抗缴“采买粮”的问题。所以，王家彦在接待完斯坦因后，又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敦煌农民方面，只能抽空与斯坦因打交道。斯坦因拜访王家彦后，制定自己在敦煌县境内的考古计划。为了得到必要的向导、劳工、驮畜和物资供应，斯坦因多次请求王家彦提供帮助。1907年3月21日下午，王家彦和敦煌驻军首领沙州营参将林太清（1852-1912）在敦煌县城北城墙上武庙里联合宴请斯坦因，讨论实际问题，也讨论新疆、敦煌的古迹问题。关于宴请的细节，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林大人和王大老爷这两个人，要在坐落在这里的城墙顶上的一处相当漂亮的寺庙里招待我们。……王大老爷出示了《敦煌县志》，上载信息说，在千佛洞有唐代几位皇帝的虔诚献礼。该书似乎还包含了来自各种历史书的摘要。其中详细说明了通往焉耆的道路。还提到了鄯善，其位置仍不明确。鄯善的位置会在库鲁克塔格的某个地点吗？令人愉快的6人聚会，吃饭过程安排得很好。忘记数一数，一共上了几道菜。客人们一定要自带揩嘴布。——向王氏解释了印度和新疆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相似之处。敏锐地关注着铁路建设方面的进展情况。讨论了旅行方面的各种需求。^①

王家彦带来的《敦煌县志》，肯定是道光版《敦煌县志》。关于此次宴请，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载说：

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小型宴会，我坦率地承认，我对宴会的布置非常赏识。……菜谱很丰盛，而且花样很多。虽然我并无能力判断菜做得怎么样，而且很快连数上菜道数的事情也给忘记了，但换换口味看来是很不错的。……王大老爷真是体贴人，他还为我准备了精神粮食。他带来了一册中国书，其中包括官修的敦煌地区地名索引之类的东西，里面尽是些史料的辑录。因此，在宴会前的准备阶段，我能够在蒋氏的帮助下搜集到大量关于唐代千佛洞遗址历史的有意义的信息，也弄清楚了近现代关于西行古道的知识是多么的模糊。^②

当斯坦因在宴会上提出募集劳工和征集驮畜的要求时，王家彦以种种理由搪塞，主要借口还是因“采买粮”事件而引发的官民矛盾。

^① 斯坦因1907年3月21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8号，第106-106v张。

^②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33.

1907年3月22日，王家彦、林太清再访斯坦因，商议劳工等问题。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午后1时，两位昂邦长官以非官方形式来访。他们显然很担忧，如何才能找到愿意去工作的敦煌人民。王氏能阅读《法显传》。”^①3月23日，斯坦因在得到一部分劳工和大车的情况下，率考察队离开敦煌县城，前往北方疏勒河流域的长城烽燧遗址。在一系列发现的刺激下，斯坦因给王家彦写了一封信，请求派遣更多的劳工，以从事更大规模的发掘。^②3月30日傍晚，王家彦应斯坦因的要求派遣的新劳工赶到遗址。斯坦因1907年3月30日日记录说：“8名新的劳工，在王大老爷派遣的新衙役的率领下，到达这里。”^③在新劳工的帮助下，斯坦因在敦煌以北疏勒河流域的长城烽燧遗址又进行了发掘工作，获得一大批简牍等文物。

王家彦代表斯坦因给升允拍发的致意电报，很快引起升允对斯坦因到访事的重视。1907年3月底，升允给甘肃省各道台下达飭令，各道台又给各知县等下达飭令，要求各地做好接待并监督斯坦因的准备。4月1日，斯坦因结束了在敦煌以北长城遗址的发掘，于4月3日和蒋孝琬一起返回敦煌县城，其他大队人马押运着行李，随后也返回敦煌城。王家彦接到升允等官员下达的要求监督斯坦因的飭令后，对斯坦因在敦煌周围长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活动产生了警觉。

就在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的当日，王家彦和林太清于1907年4月3日找上门来，名义上是登门拜访，实际上是来调查斯坦因的发掘详情。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一个小时候，林大人和王大老爷来访，一起来的。他们对我的文书极感兴趣。

已经收到总督发给所有道台们的一份电报，所产生的印象，可以从不断增加的顺利程度方面清晰地反映出来。关于在南湖等地的劳工，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关于匈奴人在这片边疆地区的进攻，王大老爷似乎知道一切。^④

关于王家彦和林太清的此次拜访，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我还没有来得及洗去脸上的尘土，我在当地不可分离的朋友和庇护人林（太清）大人和王（家彦）大老爷就登门拜访，真令我吃惊。我毫不怀疑他们两人都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回到大本营来，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想从我们自己的嘴中掏出有关我们旅行和发现物的故事。……

这事可以解释我的友好的访客们为何会不顾难堪地急忙来访。但是，在他们造访期间，我就不得不手持我自己的发现物向他们做讲解了。王大老爷是训练有素的学者，特别有热情，绝不肯放弃抚弄并即兴解读这些大汉朝“木牍文书”的享受机会。那些曾让我的“野外师爷”感到困惑的小问题，只能激起他的热情。他一只简牍接一只简牍地浏览审阅着，并且快速而且轻松地讲解着。虽然我对汉学学问

① 斯坦因1907年3月22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8号，第106v张。

②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54-55.

③ 斯坦因1907年3月30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2-3v张。

④ 斯坦因1907年4月3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7v张。

一窍不通，但我可以看得出，这位潘大人的甘肃翻版在学问方面是很扎实的。^①斯坦因于1907年4月4日在敦煌城逗留一天，于4月5日离开敦煌，向西考察南湖一带。接下来，斯坦因又考察了玉门关废墟附近的长城遗址。5月15日，斯坦因考察队结束了沙漠考察，返回敦煌县城。

王家彦于1907年4月3日打听到斯坦因考古详情及所获文物种类后，以电报形式向主管河西西段治安的肃州镇总兵柴洪山（1843-?）汇报了情况，柴洪山又以电报形式向升允汇报了情况。升允收到柴洪山的电禀后，立即以电报形式将斯坦因的考古活动汇报给了清外务部。清外务部收到升允来电后，于1907年5月20日前不久向英国驻华公使约翰·纽厄尔·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发出照会，要求英方“转电”阻止斯坦因敦煌考古。朱尔典收到清外务部的照会后，显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斯坦因敦煌考古的措施。^②

七、王家彦对斯坦因敦煌莫高窟考古的态度

斯坦因于1907年5月15日返回敦煌县城后，原计划于5月16日转赴莫高窟考察。但因5月19日是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为避开游人高峰，在王家彦的建议下，斯坦因决定将前往莫高窟的时间向后推迟5天。5月19日下午3时，王家彦拜访斯坦因，表面目的是参观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考古时发掘出来的简牍。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道：“下午3时，王大老爷来访，他是来看简牍的。他十分有把握地断言，《汉书》中不曾提到过千佛堂。他还提及一个大废址，距甘州60里地。”^③王家彦断定《汉书》中不曾提到过敦煌莫高窟，说明他曾仔细阅读过《汉书》。王家彦曾于1903-1905年任甘州厘金委员，对甘州一带的文物古迹比较了解，因此能向斯坦因推荐距离甘州60里处的一个大废址。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从敦煌县城到达莫高窟，在石窟下安营扎寨。从5月21日至6月12日，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了23天，其间从守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手中骗购大批藏经洞出土文物。^④斯坦因移驻莫高窟之初，王家彦收到升允的直接电令，要求设法劝阻斯坦因在敦煌的考古活动。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

总督命令王大老爷采取一切有策略的斯文手段，劝阻我不得进行发掘活动。他们的思路显然是这样的：我的考古活动必定会导致我去翻尸掘墓，因为坟墓是中国文物搜集者们所知道的唯一古物发现地，我翻尸掘墓就会引起大众的不满，这样一

①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68-69.

② 王冀青《陕甘总督升允阻止斯坦因敦煌考古始末》，《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4期，第122-134页。

③ 斯坦因1907年5月19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2-62v张。

④ 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54页。

来，我的人身安全就面临着危险，省政府也就有了麻烦。

据说，引起这次官场的不安的，是收到的一份来自准将衙门（Ya-mên of the Brigadier-General）的报告，该准将驻肃州，负责甘肃的这片边远地区的和平。我在敦煌县逗留时间过长，显然引起了他们的警觉。^①

所谓“准将”，指肃州镇总兵柴洪山。王家彦收到升允电令后，于1907年5月31日派沙州营左哨千总刘凤翥来莫高窟看望斯坦因。^②刘凤翥到访莫高窟，显然有监视除察看斯坦因动向的目的。

刘凤翥探访斯坦因后，王家彦也于1907年6月1日下午在前往安西直隶州的途中绕道莫高窟，向斯坦因传达升允的命令。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王家彦只能将升允电令内容告诉蒋孝琬，让蒋孝琬转告斯坦因。因王家彦来去匆匆，没能深入调查斯坦因在敦煌考古的活动，更没有了解到斯坦因与王圆禄之间已达成的秘密文物交易。斯坦因1907年6月1日日记中记录道：“下午，王大老爷（Wang-Daloi）来到这里。据解释，来访的原因是他打算动身去安西。没有提到写本的重要性。”^③斯坦因没有给王家彦解释藏经洞写本的重要性，当然也没有可能提及他购买藏经洞写本一事。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此后不久，有学问的知县王氏来访，又一次让我转移了一下注意力。王氏的来访太迟了，已无法影响我和道士之间做成的交易；我也丝毫不怀疑，我可以私下取得这位官场朋友出于学术的考虑而给予的同情。”^④

1907年6月2日上午，蒋孝琬向斯坦因转告了王家彦前日传达的信息，即升允以下的甘肃省各级官府对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很关注，并要求设法阻止他的考古工作。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当我通过蒋氏暗悉王大老爷的来访主要是起因于刚刚收到来自兰州总督（Lang-chou Viceroy）的命令时，我也忍不住慌了神。”^⑤于是，斯坦因决定派遣蒋孝琬进城，在王家彦那里斡旋一番。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中记录道：

师爷在今天上午吐露了一个秘密：在接到肃州的军事方面的大人物的报告后，总督已经下达了命令，让以礼貌的方式劝阻我不要进行发掘活动，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显然是因为发掘有可能激发起民众的偏见。我在敦煌地区长时间的逗留看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觉！王氏的确知道得更多。因此我派师爷进城，让他设法劝说王氏就我的所作所为给肃州道台写一份爽快无害的报告书，解释说我的工作是在沙漠中进行的。^⑥

①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232.

② 斯坦因1907年5月31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1v张。

③ 斯坦因1907年6月1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张。

④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232.

⑤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232.

⑥ 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张。

蒋孝琬肩负着特殊“使命”，于1907年6月2日下午返回敦煌县城，在王家彦面前为斯坦因美言，确保王家彦在给升允的回电中为斯坦因说好话。^①蒋孝琬完成任务后，于6月5日返回莫高窟。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道：“在夜里，师爷返回；他很自信地向我保证，王（家彦）已通过无线电给肃州发送了报告，报告中解释说我的‘嗜好’从性质上讲是清纯无害的。”^②

1907年6月9日上午，林太清来到莫高窟拜访斯坦因，一方面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另一方面暗示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于是斯坦因决定尽快离开敦煌，直接将所获敦煌文物和行李运到安西，不再存放到敦煌县知县衙门里。6月12日上午，斯坦因派遣行李运输队直接前往安西城，而他本人与蒋孝琬一起骑马前往敦煌县城。上午11时，斯坦因先去沙州营参府衙门与林太清道别，再到知县衙门与王家彦道别。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首先见到林大人，然后见到王大老爷。再次和这位文雅干练的学者愉快地畅谈了一番。他已经为我在安西的活动铺平了道路，他还使肃州道台消除了对我的图谋所产生的疑虑。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庄重的贵妇，摆好姿势让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③

关于为王家彦拍摄全家福一事，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在王氏那凉爽而多荫的衙门里，我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小时。在那里，我和这位文雅的学者朋友最后一次就当地的文物进行了畅谈。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高贵的主妇，刚从陕西来此地和儿子团聚。老夫人和她的儿子、儿媳一起摆好了姿势，让我给他们拍了一幅祥和的全家福（参见插图照片第209幅）。当时我怎能预见，此地很快就会出现流血和劫掠的场面！^④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为王家彦拍摄的全家福照片，即斯坦因用作《契丹沙漠废墟》插图第209幅的照片。^⑤

1907年6月12日傍晚6时，王家彦率林太清、刘凤翥等敦煌县官员，身着正式官服，在敦煌县郭城北门“归极门”的寺庙附近，为斯坦因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下午6时从花园启程。发现昂邦们和他们手下所有的官员们，都聚集在城东北门外的寺庙附近欢送我，祝我一路顺风。戴着红缨官帽的一群官员，以多彩的寺庙门廊为背景，这是一幅构图很好的画面。在高庙的阴影中，透露出古代东方的景

①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232-233.

② 斯坦因1907年6月5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7v张。

③ 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

④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233-234.

⑤ Wang Jiqing, "On the Photograph of 'Magistrate Wang and His Family'", *IDP New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No. 10, 1998, p. 6.

象，这便是我对敦煌的最后印象。^①

这是身为署敦煌县知县的王家彦最后一次与斯坦因见面。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敦煌县城后，于6月15日到达安西州城。6月24日，斯坦因一行离开安西，在祁连山北麓考察一段时间后，于7月19日到达嘉峪关。7月22日，斯坦因离开嘉峪关，到达肃州。

八、王家彦与1907年敦煌民变

当斯坦因还在敦煌以西南湖等地考古之时，王家彦于1907年4-5月在敦煌县广贴布告，宣布“采买粮”减免一半。但是，抗粮领袖武举张壶铭、附生张鉴铭兄弟则坚持要全免“采买粮”。张氏兄弟拒不接受县府的条件，违背了王家彦的意愿。到了这时，王家彦知道双方无法谈拢，决定以武力对付抗粮的农民。^②但为了保证斯坦因的人身安全，王家彦只好暂时忍耐，欲等待斯坦因离开敦煌后，再采取镇压行动。^③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敦煌县后，王家彦和林太清开始镇压抗粮农民。就在斯坦因于7月22日到达肃州的次日（7月23日），王家彦派家丁何林抓捕张壶铭，导致张壶铭坠屋身亡，激变全县民众，围攻县署。关于此次民变，《重修敦煌县志》中记载说：

王家彦愤张壶铭不服采买粮免二石，大怒。差门丁何林，带领巡勇二十名，于五鼓时轶入张堡。搜缉壶铭不得，继率众登屋。月光中瞥见壶铭，开炮轰击。壶铭身受重创，为何林推坠下屋，昏迷不知人事。何复下屋，喝令巡勇舁壶铭于县署。是时，张氏惟盘铭乘间出走外，诸男妇老少咸被殴辱，而财物亦为所劫。及至县署，时已天晓，壶铭气息不属。王令知不活，愤悔顿足。又计百姓必将激变，急商同林参将太清，扃闭城门及衙署。并令巡勇齐登署门，持炮警备。正部属间，百姓已闻壶铭身死，或闻被拘于狱，气填胸臆。于西云观、文昌宫两处，鸣钟集会，不约而同者三千人。斩关扭键，蜂拥入城，齐赴县署。众巡勇开炮轰击，而百姓只知驰救壶铭，虽枪林弹雨弗顾也。喧嚣雷动，争先破署门而入，遍觅壶铭不得。后得之署西马王庙，已气绝矣。百姓由是益愤，必欲生啖王令而甘心。而王令全家老少，早被林参将引护至参署。众百姓不见王令，愤不能泄，将署内器物任情一挥，并打死巡勇十四名，一哄而散。^④

此时斯坦因正在肃州逗留，柴洪山、肃州直隶州知州金承荫于1907年7月27日将敦煌民变的消息告诉斯坦因。斯坦因7月27日日记录说：

① 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

②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

③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233.

④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

镇台和知州（金太尊）回访。讨论敦煌发生的动乱。在敦煌，当王大老爷试图实施耽搁已久的追缴拖欠粮款计划时，他却在他的衙门里遭受到了攻击，有17-18个人被杀。显然，林大人手下的士兵根本没有做好应对暴动的准备。此地的官场情感，并没有为失去的生命感到惋惜，而只是对王氏抱有同情之心，因为他的官场生涯将因此而戛然而止。镇台倾向于妥协。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很可能会激怒敦煌人民，也会给其他官员的政治生涯招来危险！^①

斯坦因听说敦煌民变的消息后，心中又惊又喜。他知道敦煌民变对自己只有好处，因为这样一来，当事人就不会再对他在敦煌的考古活动和文物搜集品感兴趣。1907年7月28日，斯坦因一行离开肃州，前往肃州南部的祁连山脉考察。

敦煌民变发生后，陕甘总督升允迅速将王家彦撤职，任命安西直隶州吏目张乃诚护理敦煌县县篆。^②1907年9月8日至10月6日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安肃道署奉升允之命，遣差到敦煌县传唤王家彦及其门丁何林，以及张壶铭之堂兄张盘铭等，让他们全部到省城兰州对簿公堂。当这两组人到达肃州的时候，省署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委派张掖县知县潘龄皋（1867-1954）赶到肃州就近审讯。^③

王家彦在肃州接受庭审期间，斯坦因一直在祁连山里考察，直到于1907年8月26日才到达甘州。斯坦因考察甘州后，于9月13日回到肃州。9月16日下午，斯坦因离开肃州，行前专程看望了王家彦。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说：

怀着同情之心，看望了王大老爷，耽搁了更多的时间。他被传唤到这里，要让他讲清楚敦煌起义的事情。他看上去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暴徒们毁灭了他的衙门，也毁坏了属于他的所有东西。^④

对此，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解释说：

令我的感到有点情绪悲哀的是，我还遇到了博学的敦煌知县王大老爷。行政管理方面的缺陷（以及政策方面的原因）把他给牺牲掉了，使他在已经叙述过的暴乱发生之后成为民众发泄怨恨的对象。他已被暂令停职，现在正在等待着法庭的正式调查。由于官方的优柔寡断，有人试图让我的老朋友和帮手当替罪羊。我在肃州的时候，曾竭尽全力表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是我从幕后又了解到，整个审判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其目的是安抚一下公众的情绪。^⑤

斯坦因说他在肃州时“曾竭尽全力表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说明他在肃州官员面前为王家彦进行过辩解。肃州会审的结果，王家彦无罪释放，民变领袖3人被判斩首，1人被判绞刑，4人被判永远监禁（无期徒刑），其余的人免罪开释。这次审判对敦煌民众

① 斯坦因1907年7月17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114张。

②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8-649页。

③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648页。

④ 斯坦因1907年9月16日日记，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31v张。

⑤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 236.

来说带来一件好事，即“采买粮”从此全免。

九、在甘肃法政学堂执教前后的王家彦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4日回到安西直隶州后，利用敦煌县的无政府状态，又派蒋孝琬于10月1-2日去了莫高窟，从王圆禄手中购获230捆子写本，然后于10月8日离开安西，撤回到新疆境内。^①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在新疆省哈密逗留期间，通过蒋孝琬之笔，给陕甘总督升允写去一封辞别信，还在信中替王家彦求情。斯坦因对此自述道：

后来，我从哈密给总督寄去一封告别信，蒋氏让我在信中为王氏说了几句好话。我不知道总督是否真的注意到了我说的这几句好话，但是在我离开中国新疆（Turkestan）之前，蒋氏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说是王氏已被最终宣布无罪，并且在其他地方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官职。^②

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考察并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08年8月。据此可知，升允给王家彦重新安排工作的时间，是1908年夏季。

按照晚清惯例，知县级官员（尤其是大挑知县）因故不再担任实职时，往往“改教”（改任学堂教员）。我们推测，王家彦于1908年夏返回兰州后不久，就“改教”进入升允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奏请设立的甘肃法政馆。1908年10月25日至11月23日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升允奏请将甘肃法政馆改设甘肃法政学堂，王家彦自然成为第一位到堂任教的教员。关于王家彦于1909年初在甘肃法政学堂教授的课程，根据《甘肃教育官报》第5期所刊《教职员工一览表》，应是两门最重要的课程，即属于法律范围的《大清律例要义》（简称《律例》）和《宪法》。^③

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于1908年12月在英属印度首府加尔各答逗留，其间专门拜访过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哈尔考特·巴特勒（Harcourt Butler, 1869-1938），要求由印度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向帮助其考察的中国官员们表示感谢。斯坦因建议由印度政府感谢的清朝官员，包括陕甘总督升允、新疆巡抚联魁（1850-?）、新疆阿克苏道道台潘震（1850-1925）、甘肃肃州直隶州知州金承荫和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

斯坦因向印度政府外交部提出的建议，后来均得到采纳。印度政府通过英国印度事务部、外交部，给朱尔典下达了指令，让他通过清政府外务部，向斯坦因推荐的中国官员表示感谢。这一系列程序的最终完成，应该在1909年初，也就是在王家彦转任甘肃法政学堂教员、斯坦因返回英国伦敦之际。当斯坦因返回英国伦敦后，英国《泰晤士

① 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第75-83页。

②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pp. 336-337.

③ 《甘肃法政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调查表、职员调查表、教员一览表、各班学生调查总表》，《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34页。

报》于1909年4月5日以《斯坦因博士在中亚的考察》为题，刊登了一条报道：

斯坦因博士一直得到了各位中国官员的帮助，英属印度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承认了中国官员们的帮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高兴。大英国王陛下的印度事务大臣，已经奉命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和中国政府，向有关中国官员转达了英属印度政府的诚挚谢意。^①

据此可知，英属印度政府确曾通过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外交大臣以及英国驻华公使这条渠道，对王家彦等中国官员表达过感谢之情。

王家彦担任甘肃法政学堂教员的时间，最多不过4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家彦的同乡老友杨增新于1912年5月18日升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王家彦随即出关投奔杨增新。王家彦到新疆后，颇受杨增新重用，至迟于1913年2月被任命为署新疆省政府内务司长，6月29日正式担任内务司长。^②

王家彦担任新疆内务司长之际，新疆政局十分不稳定，各地起义不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武装起义军，是从1912年起由铁木耳领导的哈密维吾尔族农民起义军。铁木耳起义虽经官府多次围剿，非但没有被镇压，反而势力愈来愈大，迫使杨增新不得不改剿为抚。1913年2月，杨增新派署内务司长王家彦和回族“甘新调查员”金云伦等人，带着杨写给铁木耳的亲笔拉拢信，前往哈密收抚铁木耳起义军。1913年3月，王家彦等人进山与铁木耳谈判，最终瓦解并收编了起义军。王家彦在这次进山期间，因劳累过度、风寒侵体，返回迪化后不久便一病不起，医治无效，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去世。

王家彦去世后，杨增新于1913年11月19日给北洋政府上报《电呈请奖恤收抚哈密叛缠在事出力人员文》，其中介绍王家彦的死因时说：

窃查哈密东山叛缠狡黠异常，年来屡劳兵力，旋抚旋叛。迨本年二月，增新派已故署新疆内务司长王家彦及甘新调查员金云伦、新疆步队营长李寿福等，会同哈密文武，驰往山内收抚。该王家彦等不惮劳瘁，驰驱冰雪之中两月有余，宣布德意，用能不劳一兵，全体就抚。其在事出力人员，自应择尤请奖，以酬劳绩。正会案核办间，詎意王家彦因风雪中伤，积劳成疾，旋省数月，疾日增剧，于本年十一月一日病故。拟恳酌给恤赏银两，并援照《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第四条，给以本月之全俸，以恤遗族。^③

至1914年5月4日，杨增新又给北洋政府上报《呈请奖励剿抚哈密叛缠出力员弁文》，其中也说：

自民国元年（1912年）冬起，铁木耳聚众迭次叛逆，当经增新派队防剿，于

① “Dr. Stein's Expedi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Times*, 5 April 1909, p. 8.

② 胡正华主编《新疆职官志》，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1992年，第88页。

③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一，戡定编一，北京：新疆驻京公寓，1921年，第21页。

二年（1913年）二月设法收抚。曾将就抚情形电呈，并将在事出力之王家彦、姜国胜、李寿福、金云仑、白文超等五员先行电请分别奖恤在案。^①

从此以后，有关王家彦的记录，从史料中绝迹。王家彦的生平事迹，也逐渐被世人淡忘。

纵观王家彦的一生，并未留下太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痕迹。只有他与斯坦因的交往过程及其后果，因为事关重大，且有斯坦因著作的宣传，必定会永载史册。斯坦因于1907年将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劫往英国，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前学术界追究这段历史时，往往误将王家彦当作汪宗翰。1983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发表论文《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认定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为汪宗翰。此后多年间，国际学术界在提及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时，都指向汪宗翰。金文的第一句话是“斯坦因和蒋孝琬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抵达敦煌时，敦煌的县令是汪宗翰，也就是斯坦因有关著作里的汪大老爷”；最后一句话是“以汪氏的干练，竟因故未能察觉斯坦因的阴谋，则是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了”。^②我们既已考定斯坦因1907年所见敦煌县知县并非汪宗翰，而是王家彦，那么王家彦就应为这一悲剧性事件担负历史责任了。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指出，王家彦之所以未能阻止斯坦因劫掠敦煌文物的活动，除了一般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因和外因。王家彦于1907年临时署任敦煌县知县，主要目的是解决敦煌“采买粮”问题，并非接待并监督斯坦因的活动。王家彦与斯坦因打交道，都是奉命行事，没有深入了解斯坦因的动机。王家彦似乎对藏经洞文物不闻不问，缺乏保护敦煌文物的主观愿望。再加上斯坦因的狡猾，蒋孝琬的欺诈，致使王家彦在向上峰汇报斯坦因动向时避重就轻，偏离真相，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斯坦因的作用。

斯坦因劫获的敦煌文物于1909年初运抵英国伦敦，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所谓的“敦煌学”。王家彦于1909年初担任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的首位教员，预示着这所学校今后会有人重点研究“敦煌学”、斯坦因等课题。兰州大学与“敦煌学”之间的渊源，实可追溯至1909年。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一，戡定编一，第25页。

^② 金荣华《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华冈文科学报》第15卷，1983年，第215-218页。